

爱尔兰文艺复兴与 民族身份塑造

Self-Fashioning in the
Irish Literary Revival

陈丽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爱尔兰文艺复兴与民族身份塑造



陈丽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尔兰文艺复兴与民族身份塑造 / 陈丽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310-05080-2

I. ①爱… II. ①陈… III. ①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
研究 IV. ①I56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575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97 千字

定价:3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想象爱尔兰：谁是真正的爱尔兰人？	25
第一节 爱尔兰文艺复兴：术语界定	27
文学的繁荣	28
文艺复兴的政治性	36
结语	41
第二节 凯尔特他者：历史与固定形象	43
凯尔特简史	44
盖尔爱尔兰简史	47
凯尔特“他者”	52
第三节 民族身份塑造的不同版本	64
盖尔语联盟与“盖尔爱尔兰”	68
天主教会与“天主教爱尔兰”	70
“文化的统一”与“凯尔特爱尔兰”	73
结语	77
第二章 古代遗产的文化政治：（重新）发现爱尔兰的历史	79
第一节 关于古代文化遗产价值的争论	83
马哈菲/阿特金森事件：古代爱尔兰语文学的价值之争 ...	83
1898 年《每日快报》辩论：什么是民族文学的合适题材？	90
英—爱文学的“爱尔兰性”	94
结语	111

第二节 英雄史诗的现代复兴与挪用——以库胡林为例	112
古代爱尔兰神话史诗	115
奥格雷迪的库胡林：贵族领袖与骑士英雄	119
格雷戈里夫人的库胡林：自我辩护与自我修正	124
辛格的库胡林：仿英雄与真英雄	127
皮尔斯的库胡林：少年英雄与血祭爱尔兰	131
叶芝的库胡林：落寞英雄与英—爱孤寂	137
结语	143
第三节 朦胧微光下的爱尔兰民间传说	144
超自然现实与文化陌生化	146
反科学姿态与去英国化	149
凯尔特身份认同与另类现代性	157
结语	161
第三章 农业爱尔兰与田园诗想象	163
第一节 追寻失去的伊甸园：农业爱尔兰对工业英格兰	165
第二节 “贵族与乞丐的梦幻”：叶芝的原始主义理想	178
第三节 约翰·辛格与爱尔兰西部	196
共谋与颠覆：挑战原始主义固定形象	198
真相对想象：挑战民族主义西部神话	207
第四节 另类声音：对田园农业神话的批判	220
萧伯纳的世界主义观点	221
乔伊斯的都柏林城市视角	228
第四章 性别政治：女性化的爱尔兰与爱尔兰的女性	246
第一节 盖尔传统内女性形象的驯化与符号化	252
“主权女神”与神话原型	253
本土化女性能指与抵抗文化	259
“荡妇女王”与厌女症	264

“阿希林”诗歌与宗教认同	268
叶芝的《胡》剧与互文性留白	273
“圣母/母亲/爱尔兰”：女性的纯洁化与符号化	278
第二节 格雷戈里夫人的女性焦虑与自我赋权	285
自我书写：家族历史与阶级焦虑	289
自我编辑：对迪尔德丽故事的改写	297
自我赋权：格拉妮娅的愤怒	301
第三节 “他者”眼中的“她者”：内部殖民与女性游民.....	308
内部殖民：定居民对游民	308
游民的浪漫化呈现与叶芝的漫游者	313
女性的色情化描写与辛格的女性游民	319
结 语	331
参考文献	338
附录一：部分引用诗原文	360
附录二：人名英汉对照表	365
后 记	371

插图目录

图 1: 凯尔特语族/24

图 2: 前五世纪至罗马征服前的凯尔特疆域/46

图 3: 给芬尼亚人看病/65

图 4: 库胡林之死/136

图 5: 十字架上的基督/136

图 6: 两种力量/175

图 7: 地主、死神（饥荒）与警察并肩前行/192

图 8: 《男子气概神话与爱尔兰民族文化, 1880—1922》封面/243

图 9: 1798 年革命: 农民与神父雕像/284

图 10: 比利·伯恩雕像与爱琳饰像/284

绪 论

一个健康的民族不会特别注意自己的民族性，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不会特别注意自己的骨头一样。但是如果你打断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她将再无暇他顾，只想着将它重新接上。

——萧伯纳^①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 (Irish Literary Renaissance/Revival)，是一次举世瞩目的文化运动。它的成就不仅体现在诗歌、戏剧等各类文学作品的繁荣上，还体现在它的文化政治性上。爱尔兰自 1800 年的《联盟法案》(Act of Union) 通过之后，便完全丧失了本就脆弱的独立性，成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是爱尔兰并没有如苏格兰一样成为英国中心的一部分，而是走上了越来越激进的政治分离道路，并最终于 1922 年爱尔兰岛南北分治，南方 26 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 (the Irish Free State)。1937 年自由邦正式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爱尔兰 (Eire)，并最终于 1949 年的复活节星期一 (4 月 18 日) 宣告成立爱尔兰共和国 (Republic of Ireland)。作为爱尔兰政治建国前一次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在复兴民族文化遗产、重塑民族意识方面功不可没。

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见证了对爱尔兰后续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系列文化与政治组织的建立：盖尔语联盟 (Gaelic

^① George Bernard Shaw, "Preface for Politicians", in Seamus Deane et al (eds.), *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 (Volume II)* (Derry, Northern Ireland: Field Day Publications, 1991), 950. 本书中的英文引文，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笔者自译，特此说明。

League, 1893)、爱尔兰农业合作社 (Irish Agricultural Organisation Society, 简称 IAOS, 1894)、阿贝剧院 (Abbey Theatre, 1904)、辛芬党 (Sinn Fein, 意为“我们自己”, 1905)、爱尔兰志愿军 (Irish Volunteers, 1913)、爱尔兰公民军 (Irish Citizen Army, 1913) 等等。围绕着这些组织的成立和运作, 爱尔兰的各种政治和文化势力表达了去殖民化的共同要求, 和对未来爱尔兰的不同版本设计, 以及对“爱尔兰性”的不同主张与定义。当代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便与这一去殖民化时期反复加强的民族、宗教和性别形象紧密相关。它所培养的反帝反殖的民族自觉意识, 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政治分离主义活动的开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等文艺复兴作家, 和迈克尔·柯林斯 (Michael Collins, 1890—1922) 等革命军事领袖一样, 为自由邦的建立铺设了道路。

为了突出强调爱尔兰文艺复兴这一文化运动的政治性, 本书放弃了从纯粹美学或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叶芝等文艺复兴作家的文学作品, 而是将这些作品置于 19、20 世纪之交爱尔兰的政治文化生活的大背景中加以检验, 旨在从文化政治角度来梳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对话和思想碰撞, 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文化遗产, 及其对于 20 世纪爱尔兰民族身份塑造的巨大影响。

文学具有艺术加工性和特定的形式规范, 但是我们如果因此便将文学排除在文化与知识行为的话语范畴之外, 那就未免有失偏颇。“文学文本像冰山一样飘浮在话语的海洋中。十分之九浸没于一个更大的话语环境中, 后者在化学成分上 (如果不是在物理性质上) 与它们的物质是一致的。它们从中结晶而出, 又消融回去。”^①引文中的冰山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文学与更大的话语环

^① Joep Leerssen, *Remembrance and Imagination: Patterns in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Ire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境密不可分，从而有利于瓦解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叶芝等人对文艺复兴的非政治性的宣扬，事实上便是陷入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泥潭）。文学文本对于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性早有公认。在传播和发展文化思想的过程中，文学是一支重要的、具有塑造性影响力的力量。因而，文学文本一定要置于产生它们的大环境中加以研究，要考虑其产生的意识形态环境、折射出的话语背景以及它与其他作品的互文性影响。只有将文学作品语境化、历史化，我们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文学文本，才能避免无视或误读其中的语境信息的问题。

读者或许会发现，本书涉及的一些文学文本并非是公认的英—爱文学（Anglo-Irish literature）^①的经典作品。那是因为本书关注的并非是个别作家的艺术成就或者爱尔兰文学艺术在 20 世纪的整体传承发展，而是影响这些文学产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在文本中折射出来的有关“爱尔兰性”（Irishness）的文化论争。本书将作家个人的文学成就置于同时代文化实践的大环境中来看，展示他们对 20 世纪爱尔兰文坛以及在文学领域之外的文化生活领域所施加的影响，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新的灵感或者打开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爱尔兰作家。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书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1）爱尔兰文艺复兴作家在复兴古代凯尔特文化遗产和重塑民族文化形象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英国殖民主义和优势文化的反抗，即“去英国化”的问题；（2）这些文学作品塑造了什么样的爱尔兰“新”形象，即“自我建构”的问题；（3）这些形象在爱尔兰民众中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响，即“公众接受”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对于探讨和理解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政治性，它的多元主义文化活力，以及它对当代爱尔兰文坛的持续影响力，都至关重要。

① 以英语写作的爱尔兰文学。

“去英国化”和“自我建构”是解析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两个重要关键词，而且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承，密不可分。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 1860—1949）在一次集会上的演讲《论爱尔兰去英国化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for De-Anglicizing Ireland*, 1892），点明了在文化上去除英国影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20 世纪之交的爱尔兰作家尽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彰显其文化独特性，尤其是相对于英格兰和英国文学的独特性。不过，本书的目的并非是介绍英国与爱尔兰在文学上的异同之处，而是探讨一个具有新的民族意识的爱尔兰文学在书写其文化主张时的关注点和策略。

历史上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占领，以及英语在爱尔兰的深度普及，使得爱尔兰作家在建构新的民族身份时不得不大量依赖其与英国和英国文化的关系，也即作家自身的英国文学素养与英语文学书写传统，以及爱尔兰殖民地边缘与英格兰帝国中心的关系。而另一方面，英国文学被看作是一种帝国文化规范，爱尔兰要想建构新的民族文学便必须反叛和背离这种文化规范。事实上，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建构新的民族文学的一切努力都在试图强调爱尔兰的地方特色或本土性，以之来对抗英国文学的中心地位和普适性。这种文化依存与文化对抗的关系使得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英语文学作品，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使得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在具体如何反叛英国文化规范的问题上，爱尔兰境内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不同主张。换言之，在“去英国化”的反帝反殖主张上，爱尔兰内部能够实现“一个跨越阶级区分线的‘纵向融合’，尽管不同阶级的人群在殖民占领期间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能够在对抗殖民权力的共同立场上联合起来”。^①但是具体到“去英国化”的策略上，民族主义

^① George Cusack,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Irish Drama: W. B. Yeats, Augusta Gregory and J. M. Sy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8.

阵营内部却存在分歧。“自我塑造”的两个关键问题——谁有权塑造爱尔兰，以及他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塑造爱尔兰——搅动了文艺复兴的一池春水，水波涟漪，连绵不绝。各路作家与文人通过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等各类作品，表达自己对“爱尔兰性”的诉求和对未来国家发展蓝图的设想，并声称自己的版本才是正统的、正确的文化表达。

在这个文化论争的角力场上，二分法提供了一些方便的词汇，供不同立场（有时甚至是对立立场）的人士（如盖尔语联盟、阿贝剧院、辛芬党、农业合作运动、天主教会、阿尔斯特联盟主义者^①等）来表达相近或相左的观点：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天主教对新教、民族主义者对联盟主义者、爱尔兰语对英语、过去对现在、农业对工业、边缘对中心、乡村对都市、直觉对理性、传统性对现代性等等。莫兰（D. P. Moran, 1872—1936）还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词组来形容二元对立视角下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两个文明之间的战斗”（the battle of two civilizations）^②。这些二元对立提供了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轴线。多种轴线的并存与交叉，便造就了20世纪初爱尔兰民族身份（重新）塑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这些轴线的相互角力与竞争。

同时，随着民族重建的重点从去殖民化的对抗性民族主义（oppositional nationalism）逐渐转变为塑造后殖民国家的艰苦工作，围绕“爱尔兰性”的定义发生的各种对话、协商和斗争变得

① 1800年的《联盟法案》（Act of Union）将爱尔兰从“爱尔兰王国”（Kingdom of Ireland）变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s of Britain and Ireland）的一部分，支持这一法案的人士被称为联盟主义者（Unionists）。他们是主张爱尔兰留在英爱联盟内的亲英派。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是亲英的联盟主义者的大本营，因而又有阿尔斯特联盟主义者（Ulster Unionists）这一称谓。

② D. P. Moran, “The Philosophy of Irish Ireland (1905)”, in Seamus Deane et al (eds.), *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 (Volume II)*, 553.

愈发复杂。即使粗线条的概括,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也至少经历了四重斗争:爱尔兰和英国的对立冲突;英—爱阵营与爱尔兰本土阵营的对立冲突^①;主张靠议会斗争和平建国的“议会派”民族主义者(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ts,也称 constitutionalists)和主张暴力革命的军事民族主义者(militant nationalists,也称“分裂主义者”,separatists)之间的冲突斗争;以及接受1921年《英—爱条约》(Anglo-Irish Treaty)的“和约派”(Treatyites,也称“自由邦派”,Free Staters)和反对和约、要求建立包括北方六郡在内的统一共和国的“共和派”(Republicans)之间的冲突斗争。最后胜出的其实只是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小的分支,不仅英—爱新教徒被边缘化,连天主教阵营内的“议会派”和“共和派”都被排挤出权力中心。

在呼吁读者关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政治性和异质性的同时,本书致力于尽可能清晰地展现这一复杂的对话、协商和斗争的过程,将其中的多元诉求和文化活力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帮助读者了解谁呼应了谁,而谁又在与谁对话,从而更好地理解19、20世纪之交爱尔兰民族身份诉求的分层性和复杂性,并进而更深入地理解爱尔兰文艺复兴对于塑造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爱尔兰文化身份塑造的人为性和偶然性。有关身份塑造的文化理论给本书提供了指导框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头一次理论地阐述了民族身份的建构性和偶然性,引起高度的评论关注。如今,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文献,来论述组成民族身份的各个要素概念及其涉及的人为

^① “英—爱人士”(the Anglo-Irish)多用来指称在爱尔兰出生的英国殖民者的后裔。他们与本土爱尔兰人在宗教、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建构与“被发明的历史”(invented histories)。民族身份的人为建构性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理论概念。

具体到爱尔兰而言,重构爱尔兰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民族历史是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对抗性文化需要完成的一大任务。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爱尔兰人?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正统的爱尔兰民族文化?什么样的历史才是爱尔兰民族历史的正典?围绕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的争议与辩论就是一个界定“爱尔兰性”的协商和斗争的过程。有评论家甚至幽默地用“她的故事”(Herstory)替代“历史”(history)一词,来表明民族历史的建构性。^①真正重要的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哪一个版本的建构历史能够在复杂的民族解放过程中胜出,并最终成为新生国家的主导话语。

“爱尔兰性”的界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漫长又复杂,目前仍在不断的调整和进化过程中。爱尔兰加入欧盟、北爱尔兰局势的整体趋缓、女性地位的提升等,都在影响着当前“爱尔兰性”的界定。整体上来说,“爱尔兰性”的界定在20世纪大致经历了一个先窄化后拓宽的过程。站在21世纪回顾,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百花齐放的文学繁荣,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多样化地表达和拓宽“爱尔兰性”的努力。“爱尔兰性”的表述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即使在诸如德·布拉卡姆(Aodh de Blácam, 1890—1951)等资深民族主义者的作品中,仍有可能允许‘本土文化遗产’存在一定的不连贯性,也有可能将‘盖尔王国’(Gaeldom)建构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宗教团体的杂合体。”^②但是这种多

① Ellen-Raïssa Jackson, *Cultur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Scottish and Irish Writing*,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lasgow, 1999), <http://theses.glas.ac.uk/2548/>. 该论文第二章的题目即是《创造(她的)历史:民族戏剧》(Making Herstory: The Drama of the Nation), 详见第59页。

② Luke Gibbons, “Constructing the Canon: Vers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eamus Deane et al (eds.), *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 (Volume II)*, 954. 德·布拉卡姆是爱尔兰记者、作家、编辑,著有《通往共和之路:论新爱尔兰的社会与政治目标》(*Towards the Republic: A Study of New Ireland's Social and Political Aims*, 1918)。

样化的诉求，随着激进民族主义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上的胜利，而被渐渐边缘化。1922 年爱尔兰自由邦建立之后，中产阶级的天主教革命人士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在文化上采取保守、封闭的政策，包容性越来越低，多元主义的“爱尔兰性”文化表达越来越难以存在。对差异的低容忍度导致了“文化的删减”（cultural retrenchment）。^①“爱尔兰性”的界定日益趋向窄化，逐渐形成以“爱尔兰语+天主教+父权制”为核心的官方话语，在文化、宗教和性别政治等层面均出现高度的同质化倾向。

1924 年，《天主教快报》（*The Catholic Bulletin*）的一篇社论甚至公开直白地否定文化的多元定义，强硬地支持“爱尔兰性”的单一窄化定义：

所有的其他元素都不在爱尔兰的民族生活、文学和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并非一个民族的聚合物，也非民族大杂烩的样板；阿奥·德·布拉卡姆称之为“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那个地方的生活诗歌只有被盖尔语文学同化才能称为爱尔兰文学。^②

这种窄化的趋势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最高潮，体现在爱尔兰官方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中：从 20 世纪 20 年代便开始实行的出版审查制度（censorship）、1932 年在都柏林举行的第 31 届国际圣餐大会（the 31st International Eucharistic Congress）所昭

① Luke Gibbons, “Constructing the Canon: Vers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eamus Deane et al (eds.), *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 (Volume II)*, 954. 德·布拉卡姆是爱尔兰记者、作家、编辑，著有《通往共和之路：论新爱尔兰的社会与政治目标》（*Towards the Republic: A Study of New Ireland's Social and Political Aims*, 1918）。

② Quoted in Luke Gibbons, “Constructing the Canon: Vers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955.

示的天主教会在爱尔兰享有的无上权力^①、1932 年上台的戴·瓦拉纳（Éamon de Valera, 1882—1975）政府的保守经济政策等等。1937 年，爱尔兰自由邦通过新的宪法，在 1922 年宪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浓厚的天主教色彩。^②新的宪法以“以最神圣的圣父、圣灵、圣子的名义……”开篇，并且在第 41 条明确规定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尊崇地位。此外，第 15 条禁止离婚，反映出天主教教义的影响。其他条款在措辞上也反映出宗教（尤其是天主教）至上的特色。1937 年，宪法还规定了爱尔兰语的优势地位，第 8 条规定，英语是第二官方语言，爱尔兰语优先于英语。这些政策在彻底否认爱尔兰与英国联系的同时，也在实际上将爱尔兰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开来，造成了爱尔兰在三四十年代的极端保守与封闭。

此外，在两性关系上也出现了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1937 年的《爱尔兰宪法》，在第 41 条明确提出保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益，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将女性的社会作用局限于“家中的生活”和“在家庭中的责任”。^③康斯坦丝·马尔凯维奇伯爵夫人（Countess Constance Markiewicz, 1868—1927）、莫德·冈（Maud Gonne, 1866—1953）、“爱尔兰的女儿”（Inghinidhe na hÉireann, or Daughters of Ireland）等女性个人与团体对爱尔兰民族解放所做出

① 该大会于 1932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在都柏林举行，是 20 世纪最为盛大的罗马天主教圣餐大会之一。当年恰逢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 390-461）到爱尔兰传教 1500 周年纪念，会议的主题是“爱尔兰传教士对神圣的圣餐礼的传播”（the propagation of the Sainted Eucharist by Irish missionaries）。

② 读者可以登录爱尔兰政府（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的官方网站查看《爱尔兰宪法》的全文：<http://www.taoiseach.gov.ie/upload/publications/297.pdf>。

③ *Constitution of Ireland*, Article 41.2, <http://www.taoiseach.gov.ie/upload/publications/297.pdf>。

的贡献被淡化处理。^①对女性以及对女性身体的掌控（禁止离婚、禁止堕胎等）不再是私人问题，而上升为公共政治问题，成为以男性为主导的后殖民国家用来界定国家权力与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

英—爱人士、女性、犹太人、新教教徒、长老会教徒、游民^②、外来移民等少数裔族群被有效边缘化，排除在国家主导话语之外。诗人保罗·德肯（Paul Durcan, 1944—）在题为《爸爸，新教徒是什么？》（“What is a Protestant, Daddy?”, in *Teresa's Bar*, 1976）的诗中用戏谑的口吻讽刺“文化的删减”产生的极其窄化的“爱尔兰性”定义：

新教徒是火星人
比动物学家研究的生物
更古怪好几光年；
但很快他们都将消失
作为一个物种他们正在灭绝
很快就不再有新教徒……
哦耶，哦上帝，
我是一个正常的爱尔兰天主教小男孩
在那 20 世纪 50 年代。^③

① 马尔凯维奇伯爵夫人是出身英—爱优势阶层的爱尔兰革命者，是 1916 年复活节起义中唯一一位女性领袖，在起义失败之后被判死刑，后改为监禁。莫德·冈是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也是诗人叶芝的梦中情人，“爱尔兰的女儿”便是她发起成立的一个女性民族主义组织。

② 与定居民相对立的一个文化概念，指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人，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的分析。

③ Paul Durcan, “What is a Protestant, Daddy?”, in *The Selected Paul Durcan*, ed. Edna Longley (Belfast, The Blackstaff Press, 1982), 60.